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出版工程

Jin Dai Xue Shu Dao Lun

近代学术导论

朱维铮 著

中西書局

Jin Dai Xue Shu Daolun

近代学术导论

朱维铮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学术导论 / 朱维铮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3.3

ISBN 978-7-5475-0488-8

I. ①近… II. ①朱…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520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近代学术导论

朱维铮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庆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2000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488-8/B·032

定 价 28.00元



朱维铮

序论

—梁启超和《清代学术概论》

朱维铮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著成于一九二〇年十月间。正如作者自述，它本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就是说原来没有打算写成一部书。^①

然而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的这篇序言，也如作者自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序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②

“独立”后的原序，已被梁启超当成一部著作，因而既交给他和蒋方震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连载的同时，又寄交张之洞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单行本是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版，负责的编辑是陈叔通。^③

朱维铮手稿

旦复旦兮忆吾师(代前言)

李天纲

《近代学术导论》是朱维铮(一九三六—二〇一二,江苏无锡人)先生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为各书写的“导言”,加上相关论文的结集,曾名《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这次再为增订相关文章,都为一册,以飨读者,兼怀斯人。一九九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为题,首次结集出版朱师的这部心血之作。朱师更愿意用《晚清学术史论》为题,但是出版社希望有一个出跳点的书名。古籍社的社长、总编和编辑们都很熟悉,朱师便和大家一起不得已,从俗地想了个“求索真文明”,放在正题位置。这次再结集,用《近代学术导论》作书名,是朱师在病榻上的本意,更加妥帖。提起书名往事,也想说明:朋友之间的朱先生,其实是随和的,既能商量,也能妥协,并不像有人传说的“难合作”。

记得一九八七年底的一天下午,朱师把我叫到家中,说:“又替自己套上了一条绳索,给三联书店编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朱师说:这套丛书,是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先生提议的。当时,朱师和庞朴先生合作,在京、沪两地共同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人的约定,是准备五年出五十种,十年一百种,超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朱师独自执行主编,带研究生们一起做:用五年时间,先编三十种。以后是不是也编个一百种,就看你们了。五十初度,刚在“知天命”之年的朱师,那些年做学问,真的拼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热”出现后,大陆学术界急需这样一套资料书。后来,董先生把这套书从北京带到香港三联,利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发行网络,由大陆学者编辑这套丛书,朱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文革”刚结束,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这个专业在全国公认领先。庞朴先生几次讲,联合国有个“中国文化”项目落到他头上,查遍全国,只在复旦有半个研究室做“文化”。于是,就用这个“思想文化史”机构来组织和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此前,室内的几位先生已在蔡尚思教授主编下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四”以后思想人物的文选历有收入。朱师接手《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在“现代”之上,再编一套“近代”,顺理成章。他说:乘此机会,编辑一部能够传下去的文献丛书,对得起后人,也不让台湾学者独美。今天的学者,面对唾手可得的文献,想不起三十年前学术资料之难得。当时的情况几乎就是:占得资料,就是学者。编资料书是一件功德事。

那些年里,朱师常常自嘲干的是《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活”,是个“选家”。这个故事,他写在《走出中世纪·马纯上与匡超人》中。其实,自年轻时为周予同(一八九八—一九八一,浙江瑞安人)先生编辑《中国历史文选》,尝到文献中的甘苦,他是非常看重“文选”的。明代的江南书商做“文选”,确是生意。清代却是大学者注书、编书、刻书,做文献研究,校勘文字,既掌握了基本功,又嘉惠他人,更恩泽后世。三联的董秀玉总经理,主张学者编书,甚至说动了钱锺书先生来主编这套丛书。钱先生向来不挂名主编,但对朱师破例,同意担任。钱先生看了朱师拟定的三十种书目,又加上了马建忠和辜鸿铭。这份批改稿,朱师复印了给我,指定我编一部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合集《马氏文集》。我和其他研究生一起,已经领了《弢园文新编》、《万国公报文选》、《辜鸿铭文集》就

邀请了哲学系同届研究生汪堂家来做。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复印了《春秋大义》、《尊王篇》、《清流传》，由堂家翻译

一九八六年以后，“中国文化热”，越来越热，从上海热到北京，从学术界热到了社会上。朱师守在书斋，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还有《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稿件要看，资料要收，书信要回，来客要见，他仍然是“文革”初养成的习惯，中午起床，下午杂务，彻夜写作，上午睡觉。这样的工作节奏，加上烟酒，无疑是不健康的。有几次心脏病发作，躺在地板上喘粗气，好在边上有人，才用保心丸救回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很多人的问。“不干，干什么？”这是他答非所问的回答。真的要回答，也很容易。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内心都有从头做起，追回逝去十年的急迫。太多的学问要补做，太多的问题要回答。朱师说：要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是有人在思考，会做学问的。朱师后来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对那些满腔热血的学生们说：面对危局，中国社会需要思考，思考要用脑，不要用脚。这个话，既是对我们一辈学生，也是对他那一辈的学者说的。

整理中国近代学术遗产，离不开的思考是：中国社会如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又如何真正“走出中世纪”？这是朱师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1〕}，还有研究生们都在思考的。研究室在草创不充分的条件下，仍然培养了一些学者，和室里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朱师刚刚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一九八七），学界影响很大。一位年长些的先生质疑：中国不可能“走出中世纪”，只能被“轰出中世纪”。另一位年轻些的先生则说，中国没有中世纪，“走出中世纪”是“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这些质疑各执一词，却都有重大的理论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没有解决，当然是要和

“中国从哪里来”的问题一起思考。非常可惜,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们只顾想着符合自己意愿的终极方案,却很少关注前人走过的道路,无论是荣耀、是虚妄,是崇高、是卑劣,是深刻、是肤浅。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当然含着这样的思考。

必须马上就加以限制的是,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上,朱师断然地拒绝“学随术变”,他为“清中叶的汉学家”们辩护,一直“强调学与政的疏离”。^[2]正是这样的反复强调,加上他擅长用考据发微否定各种各样的陈词滥调,有人称他是“汉学家”。被人问到历史研究有什么用时,他也都会没好气地说:“没有用!”说说也就算了,还负气地填在表格上,无怪乎他从来拿不到什么“重大项目”。“文革”以后,朱师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学问和政治绑在一起。任何趋炎附势的“学问”,都会被他识别出来,斥为“政术”。把“学问”和“政术”区别开来,正是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强调的。“学与术二字合为一词,据我寡闻所及,通行在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以后。依据周予同先生的考察,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形态,由汉唐经学演化为宋明理学,表征是‘孟子升格运动’。”^[3]朱师对于董仲舒、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直至康有为那样用“经术”来“干政”的做法,都作了“学问”和“政声”的区分,态度就是揭露,不以为然。

“学随术变”,是朱师在经学史研究中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对周予同先生“经学是统治学说形态”理论的发展。“学贵探索,术重实用”,朱师在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着意于揭露经学史中掩藏着的“帝王南面之术”。通过“学随术变”这一线索去理解《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的一些文章,会很有意思,比如书中对康有为的揭露,就是这一原理。朱师研究康有为的文章发表后,有人问:“怎么和康有为杠上了!”确实,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一文中,有说:“假如康有为的经学造

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称,那么我们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的史料,也许可以承认他还颇有学问,从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读过《史记》、《汉书》等。不幸,我们覆按《新学伪经考》那些浩繁引证的结果,发现它们不是袭自龚自珍、魏源、廖平,便是袭自刘逢禄、陈寿祺、陈乔枏、顾怀三、侯康等的著作。本书编者不拟逐一指出康有为的印证来由,但部分校记,可证明我们所言非虚。”^[4]在这里,“本书编者”是朱师和廖梅,他们查考出《新学伪经考》的来源,坐实“抄袭”,以及“师心自用”、“倒填日月”的流传说,当然要把真相说出来。康有为有历史影响,但那是“政术”,而不是“学问”。

这些年来,曾经强硬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近代史”,已经在众多求实学者的揭露下慢慢崩解。百多年来由党派理论家们构造起来的宏大叙事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二〇〇五)都揭示了康有为的造假和抄袭行为,在今天的“凤凰大讲堂”上,康有为头上的光晕已经散去,关于他的专题已经命名为《传统名士的固执与虚妄》。然而,戳破康有为神话的工作,确实是朱师在三十多年前首先开始的,在研究室的课堂上,早有讨论。在《走出中世纪·阳明学在近代中国》(一九八七)一文中,已经有说:“自信得好像目空一切,顽强得好像执拗不堪,而且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地步。”这就是朱师给“中国的马丁路德”康有为画出的“通天教主”形象。“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神话所在多有,难道不应该用恰当的方式,一一戳破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史,差不多就是“政治史”附庸,“政治挂帅”,没有学术史,没有文化史。九十年代稍稍深入,学界试图贯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来讨论思想和学术。众说纷纭之中,朱师的

独特优势,在于他给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带来了“经学史”的视野。今天的南北学界,“经学”和“经学史”已经热得发烫,当年却是冷门得无人知晓。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学界坚持研究经学史的学者,只有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蒙文通(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盐亭人)和周予同先生。由于周先生的坚持,复旦大学是唯一系统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的学校。朱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5]培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给陈守实先生(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苏武进人)当助教,更协助周予同先生研究经学史。

经学史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曾经贯穿在二千年来的儒学、儒家和儒教的所有问题中。学者必得以经学史的方法剖析学术,很多症结才能破解,比如清末“保皇派”和“革命派”背后的“经今古文之争”。一八九八年以后,保皇党康有为和革命党章太炎,曾有过激烈的交锋,争论的焦点,很多并非直接关于“国体”、“政体”,而是集矢于经学上的“今文”、“古文”。相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揭露康有为,朱师对章太炎的研究更早进行,始于“文革”后期,表现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与姜义华合作,一九八一),以及《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对《诂书》(一九八四)的标点和整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既收入了经今文学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又收录了经古文学派章太炎的《诂书》,都是双方的代表作。《诂书》从全集本移用,而“导言”则是增订重写的。一九八六年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旭麓教授参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夸赞朱先生整理《诂书》功劳很大,从此大家能念懂《诂书》了。

一九八三年,我升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的时候,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另一位导师李华兴的名下,开始搞不懂“康章之辩”。朱师讲授“经今古文之争”后,才明白其中的核心道理。“康有

为不是说孔子‘托古改制’么？章炳麟说没有那回事，孔子只是‘删定六艺’，做了点老子、墨子不愿降低志向去做的事，岂知秦以后人们没读书，孔子便因此获得了过大的名声。”^[6]康有为取今文经学的看法，说孔子编书，藏着“微言大义”，搞的是“托古改制”，即用周代制度来改造社会。康有为想搞改革，本身并不为错。他的“虚妄”，在于自命“素王”，想当“教主”，还要用孔教会统治中国。于是，事情涉及如何确定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章太炎在《馥书·订孔》中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朱师说“订孔”其实就是“订康”。章太炎认真地与康有为讲学问：“孔氏，古良史也。”也就是说，孔子只是周代文化的传承人，不是像耶稣那样的创教者。下面的问题，即康有为“欲侔孔子于耶稣”，自己做“中国的马丁路德”，再改儒家为孔教，这些也都不能成立。从清末“经今古文之争”的例子，我们看到思想争议的背后，有着经学史、学术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杂背景。研究思想史，有易有难。舍去背景、望文生义、任意发挥很容易；实事求是、沉潜往复、探根究底就困难。朱师舍其易，取其难，身教言传，鼓励了我们这一辈学生的向学之心。

常常觉得，朱师对太炎先生比较呵护，不似他研读康有为，旨在揭露。在这方面，应该是无关乎“经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章太炎“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以及“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是朱师欣赏的。康有为固然也是一个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教主”式的想入非非，这确实是让人忍俊不止的事情。尽管朱师曾在和我的谈话录中说：他不像别人那样，喜欢谁就研究谁，或者是研究谁就喜欢谁。朱师自陈，他“有一个纯属个人的‘怪癖’，我在历史上发现自己喜欢的思想、行为，当自以为弄懂之后，便不想公之于众，一起谈论。相反，当我自以为憎恶的对象，被我弄明白底蕴之后，便很想发表。”^[7]不敢说朱师是因“憎恶”而研究康有为，康有为的学问还是属

于“弄懂”以后,值得玩味的那种。但是,朱师偏向章太炎,胜于他认同康有为,这是可以肯定的。章太炎的革命宣传,有过甚其辞的说法。和同代人一样,章太炎的不少学术观点,也和政治生涯关联,也变了好几次,朱师也说有“学随术变”的嫌疑。但章太炎以学术为本,不曲学阿世,勇敢地“匡谬”——自我纠正,这是难能可贵,值得欣赏和“喜欢”的。“康章之争”中,朱师在情感和理智上都偏向于太炎先生,这是看得出来的,也是有原因的。二〇〇〇年我在《收获》上发了一篇谈一九〇〇年的文章,用《孟子》句“虽千万人,吾往矣”说章太炎性格。手呈时曾问朱师,是否贴切,他是颌首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朱师的不幸与幸,都因他能在校园关闭,学界星散,思想钳制的“文革”中有机会读书,系里的其他老师说朱维铮是因祸得福。他先是给“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农兵们做陪读,后是为解决内衷里的苦闷自觉地读。章太炎最难读,让“小朱”去啃,当年的安置,在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在许多人或浑浑噩噩,或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不但接续了五十年代的“白专道路”,还把“新时期”最为需要的学问做出来了。一九八六年冬,在上海龙柏饭店召开的复旦大学“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差不多变成了一场重评儒学思想的会议。朱师的论文《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8]首次系统地提出:“经学、儒学和孔学,并非同一概念”,“在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中国文化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些都是朱师后来一直强调的观点,常常用以辩驳那些喋喋不休的“道统论”者。厚积薄发,排珠似亮出来的观点,有理有据。朱师提出这些观点后,谭其骧、庞朴、李学勤等历史学者都首肯赞成,我则以为这一系列观点就此构成了朱师“学随术变”论断的基础框架。

近代以前,中国学术注重积累,强调师承,这方面比西方学校有过之

无不及,这也是为什么经学史、学术史对思想研究很重要的原因。朱师能得出“学随术变”的精辟论断,和他研究章太炎《馗书》中的“儒分”与“学变”思想有关系。太炎先生当年铭志革命,重订《馗书》(一九〇四),首列《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之外,为了辩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更在开篇的地方增写了《原学》、《订孔》、《学变》、《学蛊》等篇目,对儒家源流有透彻的剖析。在章太炎看来,“儒分为八”,“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不能一概而论,“儒、道、佛”三教就更不是一回事了。把中国文化传统定为儒学一家,儒学之中又定“孔孟之道”(而非儒教之整体)一义为儒之全部,并非表彰儒家,反而大大地限制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朱师发展太炎先生的“学变说”,概括说:“儒术独尊以后的六百年学术史,认为那期间学术有五变,就是说儒术不但没有稳住统治地位,相反不断受到来自非官方的异端言行的挑战,乃至在魏晋时它自己也成为异端。”^[9]在这里,朱师的“学随术变”论断,不单是批评儒士们的“权术”行为,还指明了儒学本来的生存之道,就是“权变”。

一九五五年,朱师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学习中国古代史;一九六〇年,毕业后留校在本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分配在隋唐一段;一九六三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备受史学前辈们的瞩目。但是,除了一九六五年奉命为一篇发表后震动全国的有关明史的文艺评论文章收集史料、核对史实外,朱师并没有专门做过明清史研究,更没有越界到中国近代史。当时的学术领导,片面理解“科学性”,按照苏联大学的经验,严格划分“专门化”,专业与专业之间,壁垒森严。这种“专业分工”的格局,至今还在限制大学文、史、哲学者的治学境界,甚至造成部门之间的利益纠缠。朱师说:“二十来年前,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开始介入清

学史领域,而且首先以清末民初那段思想学说史为重心。”^{〔10〕}这篇《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的“题记”写在一九九六年,也就是说:朱师介入近代学术史研究,正是从“文革”后期研读章太炎开始的。

复旦“新三届”(七七、七八、七九)的文、史、哲系学生,曾在校刊上讨论过“专家”和“通才”的关系问题。不少人认为“文革”弄坏了学风,“以论代史”,什么都是“通史”。拨乱反正,能做个“专家”就不错了。然而,更多人以为做专家易,成通才难,而通才能兼专家,或专家能为通才则难上加难。复旦老一辈学者,很多是民国时期通才型的专家。说到中年学者,中文系的章培恒先生,历史系的朱维铮先生,是人家经常提到的,当时他们都还不到五十岁。朱师虽然被“专门化”为中国古代史,但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的学问却是贯通古今中外的。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随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陈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义宁人)学习,一生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史学史、会党史、明史,还精读《资本论》,用作研究方法。周先生的经学史研究,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章太炎的东京讲学弟子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浙江吴兴人)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独自开创的。周先生也懂“西学”,一直在与欧洲思想史的参照比较中讨论经学史。陈、周二先生学问扎实,称为“京派”,同时他们思路开阔,体系创新。五十年代以后,学术氛围越来越糟糕,学者自降其志,“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越来越多。朱师仍然有幸在复旦的小环境下,在前辈大师的视野、志向和学问的感染下,成为能兼专家的通才型学者。

八十年代初期,“党八股”顽强坚持,“洋八股”开始流行。在这样的氛围中,朱师等一批学有传承的中年学者把自己的学问与清末民初积累起来的“古今中外”之学沟通,对于“文革”后从僵死教义中恢复起来的中国学术非常重要。朱师也真的是专而通,和他一起参加过无数次的国

内外学术会议,每次都会给讲者提出很多他称之为“是什么”的事实问题,然后逼着你自己去想那些“为什么”的理论问题。常常遇到一些轻率出手的“通才”型学者被他逼问得无路可退,好些自信的“专家”也会忽然发觉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没有注意。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十多年里,各个领域内的稿子寄来,朱师都马上给出令作者们佩服的意见,有的甚至都是重新改定大纲,大量增补材料,留下的只是一个题目。很多本书,都包含了他的意见,有好多本都是朱师和庞先生出题命意,才顺利完成的。

在这里,就着行文的方便,尝试着提出朱师的两个治学特点,供同仁们讨论商榷: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或者相反),用考据学的方法做思想史(或者结合),应该可以作为朱师一生治学,并取得如此成就的两大关键。以我的理解,朱师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是这样,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更是这样,在《走出中世纪》、《求真索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书的许多篇章中,还有将来都会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遗稿中,都有这些特点。朱师最后一年多在肺科医院、肿瘤医院、中山医院和新华医院治疗期间,探视中数次以这样的概述是否妥帖为问。朱师还是一贯地不喜欢“被总结”,他总是以大度的态度说:怎样做学问,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要照我的路子走。然而,朱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现在和将来都是要总结的。我以为:这两个治学关键很重要,它们配得上清代晚期学者讨论的问题,即“贯穿古今,横通汉宋”;它们也应该和王元化(一九二〇—二〇〇八,湖北江陵人)先生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一起讨论。顺便说:二十多年里,朱师和元化先生交往最为相契。有一次,元化先生在衡山路庆余别墅二〇一房间为一件事,特别对我讲:在上海,最喜欢和你们的朱先生谈学问,不但有学问,而且有真思想。

按既定教科书的规定,中国近代史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按朱师提倡的观点,中国近代历史至少应该连贯整个十九世纪,即嘉、道年间来讲,透彻一点的话,还应该上推至明末清初。记得朱师一九八三年初次给我们一班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大家就认真而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十九世纪前后两段历史当然是连贯一致的,中国人的道路,正邪先不论,毕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内中有更多的延续性。这也是朱师没有办法苟同说中国不能自己走出中世纪,只能被“轰出中世纪”的原因。显然,说朱师借用“中世纪”概念便是“西方中心论”也不成立,因为朱师早就提出十九世纪清朝内部有“自改革”的主张。正好是龚自珍本人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也已经搞不下去了,必须改革。二〇〇〇年,朱师、龙应台合作编辑的《未完成的革命》出版大陆版,易名《维新旧梦录》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线索就是“自改革”。我顺此思路,应命写了书评《历史活着》,得到了朱师的首肯。^[11]

因为这样的历史观,朱师便不会割断清代的历史,也去弄一部半吊子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入的首部著作便是江藩(一七六一——一八三一,江苏甘泉人)在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刻印的《汉学师承记》和道光二年(一八二三)刻印的《宋学渊源记》,还有方东树(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安徽桐城人)在道光年间刊刻的《汉学商兑》。这三本书都为一册,以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作开端,再以清代末年的“康章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为结束,这样的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呈现出一个“经学史”的条贯,比一般外缘式的评论叙述深入许多。这三部“汉学与反汉学”是叙述清代学术的代表作,学者多用作“乾嘉故老”们的谈助资料。朱师却是通过考证其中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与“桐城派”的复杂关系,令人信服地证明那场剑拔弩张的“汉宋之